

中国研究



本期焦点·社会治理

『雪中送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基层政治信任 李忠路 吴晓刚

信息不对称：『大村』作为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运作困境

——以米村为研究对象 刘升

资源依赖视角下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 梁灼彪

话语转型、体制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 柳建坤

钢琴无用：上海中产阶层家长的文化资本培养策略 田丰 汤敏



CHINA STUDIES **No.24**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研究. 第 24 期 / 周晓虹, 谢曙光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1

ISBN 978 - 7 - 5201 - 5399 - 7

I. ①中… II. ①周… ②谢… III. ①社会发展 - 研
究 - 中国 - 现代 - 丛刊 IV. ①D668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80194 号

中国研究 (第 24 期)

主 编 / 周晓虹 谢曙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胡庆英

文稿编辑 / 许文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群学出版分社 (010) 59366453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5399 - 7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封面题字：金耀基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音序排列）：

Anagnost, Ann（美国华盛顿大学）
边燕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Christiansen, Flemming（英国利兹大学）
Duara, Prasenjit（美国芝加哥大学）
范 可（南京大学）
风笑天（南京大学）
Friedman, Edward（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关信基（香港中文大学）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
Houlden, Gordon（加拿大爱尔伯特大学）
黄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加加美光行（日本爱知大学）
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 强（清华大学）
李友梅（上海大学）
林 南（美国杜克大学）
刘 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马 戎（北京大学）
Mohanty, Manoranjan（印度德里大学）
Perry, Elizabeth（美国哈佛大学）
乔 健（台湾东华大学）
Stafford, Charles（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Unger, Jonath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Vogel, Ezra F.（美国哈佛大学）
汪 晖（清华大学）
王庚武（新加坡国立大学）
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园田茂人（日本东京大学）
翟学伟（南京大学）
张玉林（南京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周晓虹（南京大学）
周 怡（复旦大学）

主编：
周晓虹 谢曙光

编辑部主任：
周培勤

编辑：
杨渝东
陆 远
郭 未

英文编辑：
秦 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发 刊 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 1949 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 1978 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 19 世纪、20 世纪和 21 世纪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中国学界面向全球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人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都既属

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年5月

目 录

主题研讨：组织、制度与治理

- “雪中送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基层政治信任
..... 李忠路 吴晓刚 / 1
- 信息不对称：“大村”作为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运作困境
——以米村为研究对象 刘 升 / 21
- 互联网驱动、教育帮扶与成绩提升
——基于 S 县“云录播课堂”的分析 谢治菊 肖林根 / 36
- 资源依赖视角下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 梁灼彪 / 52
- 话语转型、体制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 柳建坤 / 75

学术论文

- 钢琴无用：上海中产阶层家长的文化资本培养策略
..... 田 丰 杨张韞宇 / 95
- 品位分化与空间区隔：下层青年网络表演的社会意涵
——对快手用户群体的研究 张恒宇 冯 强 / 113
- 变迁中的女性形象再探
——基于《中国妇女》杂志（1950~2015）的内容分析
..... 聂 焱 王晓焘 / 133

中国人关系网络中的结构平衡模式机制研究

——以江苏省芦山村丧礼随礼行为为例 宓淑贤 / 156

信任何以被摧毁？

——基于西北地区 F 县民间借贷危机的考察

..... 程 军 刘玉珍 / 181

王学中的三种庶民教化形式 王 格 / 195

书评与随笔

性别，历史与记忆

——评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 刘 洁 / 207

与学科理论对话还是与中国研究对话？ 欧博文 / 216

《中国研究》稿约 224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226

“雪中送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基层政治信任

李忠路 吴晓刚*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 2012)，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民众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最低生活保障的实施能显著提高弱势群体对基层政府官员的信任水平，领取低保的群体更加信任基层政府官员；代表民生工作的地方低保救助率与民众政治信任水平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现阶段，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能带来更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本文认为，民众的政治信任不单取决于政府绩效或个人生活境遇，更取决于政府绩效的惠及性和可感知性，即个人能否感知到政府的绩效表现以及是否从中获益。

关键词：最低生活保障 弱势群体 政府绩效 政治信任

一 引言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民众对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是政治支持

* 李忠路，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 (sozlli@126.com)；吴晓刚，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sowu@ust.hk)。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受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本文系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项目(18QFC42)阶段性研究成果，数据分析受到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项目(GRF 644510)、中央政策组公共政策研究资助计划(PPR14HS04)和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政权合法性和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政府由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政治信任和支持(何增科等,2007; Gilley, 2008; 马得勇、王正绪,2012)。然而,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有些群体,如由下岗工人、无业人员、失地农民及其供养家庭等组成的城乡贫困群体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一般研究认为,那些从改革中获益甚微的弱势群体可能会对政府或社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为妥善解决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其中覆盖范围最广的当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作为一项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政策,低保在保障我国城乡贫困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喻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重视和各项相关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低保救助标准显著提高,覆盖人群不断扩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惠民生、解民忧、保稳定、促和谐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①研究表明,低保补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乡贫困的发生率,增加了困难家庭在食物、健康、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投入(Gao et al., 2014)。中央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不断向民生领域倾斜,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地方政府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自主权也不断增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绩效表现与其辖区内居民的福祉及生活机会密切相关,从而形塑着居民对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感知和评价。既有研究发现,当前民众的理论信任水平随政府层次的降低而下降,即从对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越来越低。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与民众直接发生互动关系,是他们了解政府,形成政治信任的主要渠道。民众对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和支持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②在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呈现“央强地弱”的格局下,基层政府如何才能获得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政治信

①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号)。

② 《习近平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5-01/12/c_127380367.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4月10日。

任和支持？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对于深化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涵。本文以低保为例，来探究地方政府如何获得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政治信任。具体来说，我们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要制度安排，低保能否提高民众对基层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水平？第二，基层政府在以低保救助为代表的民生工作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如何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本文试图通过对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来解答上述问题。在此之前，本文将首先对政治信任的相关研究进行必要的梳理。

二 政治信任及相关研究

（一）政治信任及理论解释

政治信任一般被定义为市民对政府机构或政治系统能够提供和他们预期结果相一致的物品或服务的信念（Easton, 1975）。伊斯顿（Easton）认为，政治系统中存在具体支持（specific support）和弥散支持（diffuse support）两种类型的政治支持，前者体现为对政府绩效和在职官员的支持，后者则是对政治体制及其运行规则的支持。在伊斯顿的基础上，学者将政治信任区分为对政治共同体的信任、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对政治权威的信任（Norris, 1999）。故而，政治信任水平的下降可能反映了公民对政治体制和运行原则的不满（Miller, 1974），也有可能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绩效和就职人员的不满（Citrin & Green, 1986）。关于对政治机构和政治权威信任程度的区分，孟天广（2014）通过比较中国民众对政治机构和政治精英的信任水平发现，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对政治精英的信任水平。同时，民众对二者的信任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具有很强的同构性。作为联结个体公民与政治机构的纽带，政治信任既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表现，又是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微观基础。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能使政府无须借助强制性手段即可获取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同，而较低水平的政治信任则可能使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的管治，甚至会引发社会冲突。鉴于政治信任对于维护政权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对政治信任的起源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可以归纳为制度主义视角和文化主义视角两种传统（Mishler & Rose, 2001）。制度主义传统主要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来解释民众政治信任水平的起源，认为政治信任不

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信任,而是内生于政治系统的,故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主要是基于其对政治机构产出的理性计算。一个政府能否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主要取决于其善治的能力和表现(Riker; 1990; Shi, 2001)。政府的治理绩效(如经济增长、失业率、犯罪率、社会福利提供等)对民众的政治信任有重要影响。与制度主义强调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绩效表现进行理性评价的观点不同,文化主义传统认为政治信任是外生于政治系统的,强调价值观念和人际信任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概括来说,文化主义解释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假设:一是早年社会化影响说,认为个人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对政治信任具有长远而稳定的影响(Newton, 2001);二是社会信任产生政治信任假设,认为政治信任是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推广到政治领域的一种表现,对他人有较高信任水平的人往往表现出政治方面的信任(Putnam et al., 1993);三是后物质主义转向假设,认为长久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将会使公民从关注物质生活向关注个人自主、自我表达等需要过渡,从而对政府表现出更多的批评和不信任(Inglehart, 1997)。

(二) 关于中国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借鉴上述理论视角,学者们对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①,这些研究主要的发现总结如下。首先,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政治信任水平下降趋势不同,跨国比较研究表明,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Gilley, 2008; 马得勇, 2007; Wang, 2010; 孟天广, 2014)。例如,2012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有92%的中国民众对政府机构持肯定态度,远高于49%的世界平均水平。其次,研究表明,虽然中央政府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呈现“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民众政治信任水平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下降,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最高,其次是省级政府和区县政府,对乡镇政府的信任水平最低,中国基层政府的信任状况正在趋于恶化(Li, 2004; 肖唐镖、王欣, 2010; 胡荣等, 2011; 高学德、翟学伟, 2013; 孟天广, 2014)。此外,孟天广

^① 目前关于中国政治信任实证研究主要使用的数据有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亚洲民主动态调查(The Asian Barometers Survey)、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及由学者主持的专题调查等。

(2014) 的研究还发现,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不仅存在“中央—地方”的差序格局,也存在“司法—行政”的分化,民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水平高于对行政机构的信任水平,其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近年来法制改革的效果。最后,就伊斯顿所区分的具体支持和弥散支持而言,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呈现较高水平的弥散支持和较低水平的具体支持(Chen et al., 1997; Li, 2004; 孟天广, 2014)。例如,陈捷将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分为情感支持(对政治系统和政治原则的支持)和工具支持(对政府绩效表现和具体政策的支持),他发现民众对中国政府有高度的情感支持和较低水平的工具支持(Chen et al., 1997)。李连江发现,农民虽然相信中央政府施行善治的意图,但不相信其监督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能力(Li, 2004)。孟天广(2014)关于政治精英与政治机构区分的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对政治精英的信任水平。在理论解释上,大多数研究基本是围绕文化主义视角和制度主义视角两个传统展开的,且各自都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文化主义视角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比如,史天健通过分析1993年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调查数据发现,威权与和谐的传统价值观念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民众的政治信任都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其影响程度大于政府绩效的影响(Shi, 2001)。马得勇(2007)对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分析也发现,威权主义价值观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影响。胡荣等(2011)借鉴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发现社会信任和公共事务参与对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有显著正向作用。高学德和翟学伟(2013)对中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发现,个人的威权主义倾向对城乡居民政府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李锋和孟天广(2014)关于政治信任来源的分析发现,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路径相对有限,政治文化路径的解释可以产生很大影响,政治文化、威权主义价值观与政治效能感都在不同层次、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

制度主义解释框架强调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绩效表现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民众对政府的经济表现和社会治理的正面评价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Wang, 2010; 胡荣等, 2011; 高学德、翟学伟, 2013)。孟天广和杨明(2012)的分析也表明,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有重要影响:在高人均福利支出、低基尼系数和低失业率的区县,政治信任水平更高。吕晓波(Lü, 2014)发现,废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但

并未显著提高人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李忠路和吴晓刚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的研究发现，新农保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Li & Wu, 2018）。何增科、王海、舒耕德（2007）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相关文献资料和实地评估报告进行分析后指出，地方政府在政治类改革（民主选举、公民参与、权力监督等）、行政类改革（行政审批、社区管理等）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治理改革与创新（扶贫救助、社区服务等）显著增强了地方政府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马得勇和王正绪（2012）对10省市20乡镇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公推直选制度的实施，明显地提高了民众对基层乡镇政府的支持度和信任度。

三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旨在从制度主义视角来探究政府绩效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我们主要关注地方政府在以实行低保为代表的民生工作方面的绩效表现是否会影响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伊斯顿所界定的“具体支持”）及其影响机制。基于对以往研究的回顾，我们认为这些关于政府绩效与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忽略了制度主义解释的一个关键点，即个体“具体政治信任”主要起源于其对政府机构产出的满意程度。政府绩效发挥作用的条件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一是政府绩效的可感知性（policy awareness），即个人能否感知和意识到政府的绩效表现；二是政府绩效的惠及性（policy benefit），即个人能否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获益（Easton, 1975）。换言之，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可能不单取决于政府绩效或个人的特征和生活境遇，而更取决于两者的交互作用，即取决于个人能否感知到政府的绩效表现以及个体是否从中获益。随着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环境治理、公共交通、民生保障等方面的自主权和责任不断增强。就政府绩效的可感知性而言，有些产出是具有高度透明性的，如公共交通建设、公共教育和医疗等，有些则很难被民众感知到，如GDP增长率、惩治官员腐败等。就政府绩效的惠及性而言，有些是惠及全体民众的，如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环境治理等，也有些是面向特定群体的，如失业保险支出、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等。我们认为，可感知性和惠及性不同的政府绩效对政治信任可能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对政府绩效的感知程度和从中的获益程度也有所不同。在研究

时，我们不应只是检验政府绩效能否提高政治信任水平，而需要进一步关注不同类型的政府绩效对不同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有何影响。本文以低保为例，将是否领取低保补助看作政府绩效惠及性的测量指标，将地方低保救助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看作可感知的政府绩效。通过比较同一地区内领取低保补助和未领取低保补助的群体对基层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水平，来检验政府绩效的惠及性对政治信任的影响；通过地区间的横向比较来探讨地方政府在低保救助工作和经济发展等可感知性程度不同的政府绩效如何影响政治信任水平。在个体层次上，我们将是否领取低保视为政府绩效的惠及性项目，即个人是否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获益。根据经济人理性假设和制度主义的解释，从政府绩效中获益的个体可能会对政府有更高的评价和认可。我们认为，在控制了个人的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获得低保补助的群体对地方政府更加信任。故而，我们提出研究假设1：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未领取低保补助的群体而言，领取低保补助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更高。

此外，虽然低保的目标群体是社会中的贫困人员和弱势群体，但在具体执行中，未必所有的弱势群体都能获得低保补助，而获得低保补助的也未必全都属于弱势群体。相比于非弱势群体而言，低保补助对弱势群体的边际效用更大，是否领取低保补助对一些弱势群体而言更为重要，因而，我们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1a：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领取低保补助对弱势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影响更大。

在地区层次上，地方低保救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地方政府在民生工作方面的绩效表现。根据相关规定，低保的审批结果需要在村（居）委会层次进行公示^①，因而，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其被民众感知的程度和机会相对较高。海贝勒（2007）在对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实地调研中也发现，低保可以直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同时也可以安慰那些不依靠低保的社会成员，因为通过地方的低保工作，他们可以看到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相信政府在他们陷入困境时也会给予帮助。据此，我们提

^①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号）。

出研究假设 2:

地方低保救助率对民众政治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低保救助率越高的地方, 人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

由于低保的目标群体是贫困和弱势群体, 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地方的低保救助工作, 更有可能去关注地方的低保救助率, 因而, 我们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 2a: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低保救助率对弱势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影响更大。

在接下来的部分, 本文将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我们将重点探讨 4 个问题: 哪些人在领取低保补助, 领取低保补助是否影响政治信任, 低保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否存在城乡差异, 以及地方在低保救助工作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如何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

四 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12 年调查数据。CFPS 是一项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 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 以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为目标的重大社会科学项目。CFPS 采用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系统概率抽样方式, 其样本来自中国 25 个省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的家庭及其成员。CFPS 2010 初期调查共收回 14960 份家庭问卷, 33600 份 16 岁及以上的成人问卷和 8990 份 16 岁以下的少儿问卷。CFPS 2012 成功访问了 2010 年 14960 个家庭中的 12726 个家庭及其成员, 最终完成了 13459 份家庭问卷(含新组家庭)、36063 份 16 岁及以上的成人问卷和 8630 份 16 岁以下的少儿问卷。本文的分析对象为 CFPS 2012 中 16 岁及以上的成人样本, 并将其与家庭问卷、社区问卷和区县数据库进行匹配。在分析时, 我们相应删除了

在主要分析变量上含有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进入我们主分析的样本为来自 11324 个家庭的 29908 名成人。

（二）变量

1. 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本文的主要因变量，根据 CFPS 2012 问卷中的信息，我们把政治信任界定为民众对基层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即伊斯顿所界定的“具体支持”或孟天广所界定的对“政治精英”的信任。CFPS 2012 的提问方式为“您对干部的信任程度如何？（干部指当地地方政府官员）”并约定 1 到 10 的定序变量，取值越高表明信任水平越高。

2. 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是本文主要分析和比较的对象。我们主要根据 CFPS 家庭成员对“您在本地的收入水平？”的主观评价来界定弱势群体，即如果该家庭中一半以上的成员认为其收入地位在当地处于最底层，我们将该家庭界定为弱势群体家庭。通过对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观评价来界定弱势群体可能与其客观经济收入存在一定的偏差（范晓光、陈云松，2015），本文采用主观评价的方法来界定弱势群体，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由于客观贫困的界定需要详尽地了解家庭收入和支出状况，这不仅在社会调查中很难进行精确测量，即便是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家庭也未必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其各项收入。实际上，每个人对贫困都有自己的理解，他们是自己经济状况的最佳评判者，而且关于贫困的主观认定通常更具有社会比较和社会态度的意涵。第二，由于目前我国在经济发展程度和消费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采用主观认定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地区差异的影响。我们期待在将来的研究中，能够完善本文关于弱势群体界定的不足之处。

3. 低保补助

是否领取低保补助，是我们解释政治信任的关键自变量，为二分类变量（1 = 低保家庭，0 = 非低保家庭）。我们将凡是回答在 2011 年接受过低保补助、五保户补助和特困户补助的家庭均界定为低保家庭。

4. 区县低保救助率

低保救助率是地方政府在低保工作方面的绩效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是我们解释政治信任地区差异的重要变量。理想的低保救助率测量方法，是根据各地实际低保发放人数和符合低